

香港教科書政策的理念和實踐

林智中

近年來香港政府制訂政策鼓勵學校開發校本教材，但是教科書仍然是香港教師最常用的教學材料。這種現象的背後，是教師們沒有時間或缺乏專業的技能來設計高質量的校本教材。與香港政府在經濟上的「自由不干預」政策相適應，政府將教科書出版視為一種商業活動。出版商之間的競爭促進教科書質量的不斷提高。這一教科書出版系統並不意味著政府角色的缺失，教科書出版商多會將教科書送交政府進行審查，這成為香港教科書質量保證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教師選擇教科書的專業性也是保證教科書市場化營運成功的重要元素。

關鍵詞：香港、教科書、市場機制

收件：2008年7月29日；修改：2008年11月3日；接受：2008年11月13日

Textbook Policy in Hong Kong: Rationale and Practice

Chi-Chung Lam

Textbooks are still widely used in schools in Hong Kong despite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Behind this situation lies the fact that teachers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expertise to design high-quality school-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line with its *laissez-faire* economic policy, has treated textbook publishing as a commercial activity. The competition among publishers has led to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fforts. However, this system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 part to play. Textbook publishers usually submit their products to the Government for review. This is a major part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textbook publishing. In addition, teacher professionalism in selecting textbooks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of the success of the textbook marketiz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Hong Kong, textbook, market mechanism

Received: July 29, 2008; Revised: November 3, 2008; Accepted: November 13, 2008

壹、引言

教科書是香港教師最常用的教學材料。每年，學生及家長花在教科書的金錢不少，以一位普通的小五及初中二學生為例，購買一整套供一個學年用的教科書，要花港幣 2,200 元¹。既然學生要花大量的金錢，家長自然有所期待及訴求。另一方面，教科書是最重要的教學材料，自然也成為推動教育改革者關注的項目。事實上，教育改革於 2000 年展開的時候，改革的矛頭有多處，改革灌輸型教學是其中一項（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而教科書是灌輸型教學的「凶器」之一。教師在課堂上把教科書的內容鉅細無遺地傳授予學生，然後想方設法讓學生牢記內容，到了考試的時候，把意念傾瀉到考卷上。因此，有一段時間，香港的教改熱心人士大力鼓吹學校和教師放棄使用教科書。特別是支持資訊科技的人士，他們認為科技的進步已促使教學範式的轉變，學校教師大可利用網上材料來教學，讓學生利用網上材料，進行研習及分析，建構自己的知識。在這種情景下，討論教科書的地位、使用方式和管制等等，自然不斷浮現。在這篇文章裏，研究者將會探討香港政府對教科書的使用及發展的政策，以及實際操作的狀況。

貳、校本課程改革與教科書的發展

一直以來，香港的課程發展系統採用「中央——外圍」形式，學校及教師採用官方所訂的課程，而教科書則是按官方課程編寫（Morris, 1996）。不過，這並不代表政府全面肯定教科書的地位。事實上，從二十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香港政府曾多次希望推行校本課程，這對教科書的政策有一定的影響。二十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香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普遍察覺到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問題。於是構想及推出了各項政

¹ 研究者搜集了 4 所中學及 2 所小學，得出的平均數。

策，期望學校及教師能按學生的特質實施課程剪裁，其中 1988 年推行的校本課程計畫便是一個例子。譚萬鈞、林智中（2006：29）綜合描繪了這項計畫的背景及計畫的精神如下：

「自 1979 開始，香港的教育已從菁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學生無論來自何種社會階層都必須接受九年強迫基本教育，因此突顯了學校面對學生學習差異的問題，學校覺察到單一的中央課程已不能照顧學生個別差異（McClelland, 1991），這個差異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個別學校學生的差異，其二是同一學校，校內學生的差異。學校為著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在教學的目標、內容、方法和評估上都可能要作出調適。在 7、80 年代，基於學校課程受中央課程的規限，教師只能在課堂教學上修修補補，未能在學校課程的整個層面及從課程概念入手來調適學校課程，提供拔尖保底的教育，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學校辦學水平及教師專業能力日漸提升，教育界開始渴求學校能參與課程發展，讓學校在中央的課程架構下，自行發展校本課程，改變以往由上而下、中央獨攬包辦的課程模式。教育界在這樣的呼籲下，教育當局終於在 1988 年作出了回應，以校本課程設計計畫的形式首度由官方鼓勵學校推行校本課程。」

參與是項計畫的教師可嘗試在下列主要設計項目中發展校本課程（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1988）：

1. 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設計創新的教學法；
2. 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設計一些可供替代的新課題或學習領域；
3. 就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要的課題，發展適切的教材，照顧某些能力的學生的學習需要。

校本課程設計計畫就是要在官方頒布的課程框架下，由教師自行設計教材。而官方推動的校本課程發展並不侷限於這項計畫。1994年推動的目標為本課程，目的之一也是期望教師能按學生的水平，設計不同的課程，增強學習效果。在官方頒布的《目標為本課程簡介》中，明確地指出「九年免費，強迫和普及教育。事實上已替代了以往的菁英教育，因應這些轉變，學校課程必須照顧學生不同需要和能力的差異」（教育署，1994：5）。目標為本課程下，教師被要求自行為學生編寫課堂用的工作紙及課後家課。而這些工作紙及家課可以有3種不同難度，以滿足1個班級裏面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需要。

到了2000年推行的教育改革，發展校本課程成為了改革方向之一，教科書被改革者視為窒礙改革實施的絆腳石。中文科的情況正好說明官方的政策。中文科放棄傳統的範文教學，改行單元教學。傳統的範文教學的教材以文字資料為主，而內容也未完全切合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需要，以致影響學生興趣和學習成效（課程發展議會，2000：6）。教育當局希望能夠均衡發展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增強共通能力的培養，加強文化學習，拓闊學生的閱讀面及增加閱讀量，協助學生主動學習，而要達致這些目標，教育當局期望「教師從中央課程的執行者，轉而為校本課程的主人翁」。理想的做法是教師按自己學生的水平、性向、強弱項編訂校本課程，並自行編制多元化的學生材料（課程發展議會，2002）。為了落實中文科課程改革，官方投入了大量資源，組織學校試行新課程，提供專業人員協助學校教師編訂校本課程及教材，並把這些校本教材編印供其他中文科教師參考。刊印校本教材並不侷限於中文科，英文科也有這樣的做法（見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4）。在地理科方面，官方把不少校本教材，製作成光碟片，供教師參考使用。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官方是期望學校減少依賴教科書，以校本教材取代。這政策是基於教科書未能有效照顧學生之間的差異，而教科書的設計，也往往流於知識的灌輸，在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及共通能力方面，有所不足。

不過，官方推動的校本教材取代教科書，並未見成功。就以中文科為例，雖然投入了大量資源，負責中文科發展的官員大力推動，但是兩項研究均顯示，中文科教師對校本教材發展不大支持（黃顯華、李玉蓉，2006；譚彩鳳，2005）。譚彩鳳（2005）的研究發現在教師眼中，這項政策有點不切實際。教師認為他們根本欠缺時間和能力發展高質素教材。香港的課程改革已推行了6年多，絕大部分學校還是使用教科書，自行研發校本教材的寥寥可數。為甚麼香港教師選擇使用教科書，而不自行發展校本教材呢？

首先，香港教師長時間以來習慣使用教科書。不少出版社更提供配套的教學材料，例如掛圖、PPT等等，方便教師教學。既然教科書方便易用，教師把編寫校本教材作為額外工作，並不熱衷。同時，香港教師的工作量極重，每天平均要上5節課（平均每節40分鐘），還要當班主任、帶領課外活動，並兼顧其它行政工作，例如招生等（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在繁重的工作量下，就算他們有心，也很難抽出大量的時間來自行研發教材。

同時，如藍順德（2003）說：「研究課程的學者都同意，教科書是發展出來的，而不是撰寫出來的，教科書的發展過程至少應包括課程規劃、教科書研發、編輯、審查、實驗、試用、發行、選用、評鑑等程序，在此歷程中並隨時檢討修正」。因此，設計發展教材並不是把需要教授的內容寫出來這麼簡單，優秀的教材是需要研發的。在這一過程中，編寫教材的人員需要對課程要求、學生心理及發展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做到深入淺出的表達。此外，亦要高度掌握 Shulman（1987）提出的「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把教師知識中的兩個實體，即可教的內容及學生能掌握的內容作合理的揉合。我們還要考慮教材的物理屬性，包括：版面設計、印製、裝訂、紙質等，其中版面設計一項包括了插圖設計、顏色配合等（林枚伶、陳國彥，2003）。要做好這方方面面的功夫，需要專業能力及時間。以圖1和圖2為例，圖1是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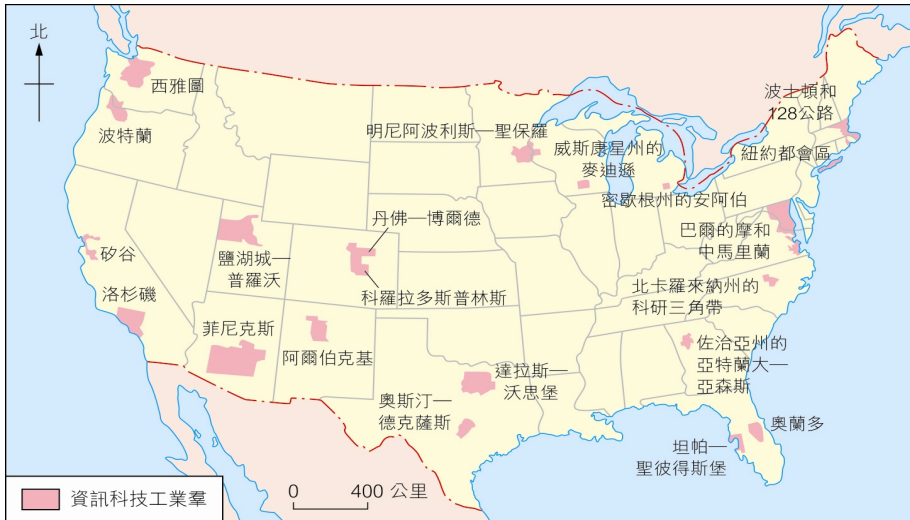


圖 1 資訊科技工業羣

資料來源：出自葉劍威、林智中、施明輝、黃錦輝及楊錦泉（2003：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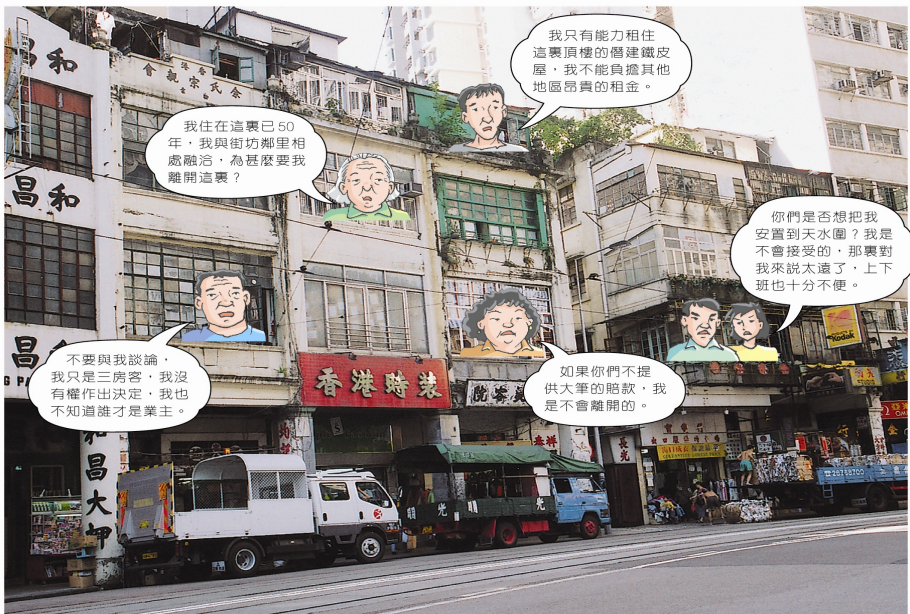


圖 2 進行市區重建會遇到甚麼困難

資料來源：出自葉劍威等人（2003：91）。

究者在文獻中找到的美國各地的資訊科技集中地，然後由繪製地圖的美工逐點在地圖上列出；並在每個地區加上主要城市名稱，以顯示信息科技生產中心與大城市的關係；圖 2 帶有高度的原創性，通過在圖片上加入漫畫，把居民對市區重建的看法清晰地顯示出來。沒有了優秀的美工和研究者的意念相配合，不大可能研發出高質量的插圖。

參、教科書的研發及編寫

在教科書的編寫方面，香港一直採用私營制度，官方把教科書的編寫、研發、印刷視為商業行為。不過，這並不代表完全的自由放任，特別是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當時在教育體制上明確要求教師和學校必須採用經教育署長批准的課程及教材（Morris, 1996）。在這制度下教科書出版商在編寫教科書時，都會嚴格按照官方所頒布的課程來編寫，連內容標題也不會改動。而編寫好的教科書稿件，必須送至教育署的視學輔導處²進行評審，合格的便會列入推介教科書目錄內。學校和教師會從這名單內選取教科書。這條例主要防止學校及教師採用富政治色彩的課程及教材。隨著校本課程政策的逐步推行，這教育條例便顯得過時，於是在 90 年代中期已被刪除。換言之，學校和教師享有完全的自主性來選取他們喜愛的教科書。按理，教科書出版商不一定要把教科書送審，他們可以選用審定教科書目錄以外的教材。事實上，也有小部分教師自行開發校本教材。教育局甚至規定於明年推行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中，不鼓勵學校使用教科書。但是，現時出版商還是選擇把教科書送往教育局³進行評審。通過評審的教科書，可在封底或封面上，加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已列入通用書目表」(on recommended textbook list) 的印章。一般教師視之為質素的保證，因為在評審過程中，官方對教科書的內容、文字表述、數表設計、教學活動等等，均有一定的要求。

² 上世紀 90 年代初，負責課本審查工作的是教育署視學輔導處。回歸後，教育管理系統進行了改組，現時負責課本審查工作的是課本委員會。

³ 負責香港教育的政府部門於 2007 年夏天由教育統籌局改稱教育局。

肆、教科書審查的要求

負責審查教科書的政府部門，在收到教科書稿件後，會邀請對該學科有豐富經驗的教師或學者擔任評審員。為了減低評審員的壓力，評審員的身分保密，不過，教科書研究者和出版商的身分並不是保密的。在審核教科書時，評審員要按照官方所定出的一系列指標來評等級，並列出出版商和研究者需要修改的地方。官方的指標範圍很廣，包括了內容的涵蓋範圍、教學活動的多樣性及設計、語文、編印設計等。這些指標與現行教育改革的方向配合。例如，要求教科書編寫者「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共通能力，以助學生學會學習」；另一方面，亦要求教科書內的評估活動能達致「為學習而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的改革方向，所以在指標中，有以下的具體說明（課程發展議會，2002）：

學生可以在不同環境，透過不同途徑學習。因此，學習並不侷限於課本及課堂上，更包括各種學習材料和經驗。不過，儘管課本並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它對學生的學習仍然十分重要，因為課本不單是教師授課的教材，也是學生在家裏預習或溫習的自學材料。

配合以學生為本課程的優質課本，除了涵蓋各科目課程的核心內容外，還提供有助學生研習該科的學習策略。由於課本是學生重要的閱讀材料，課文的質與量就行審慎留意，因為它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從而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事實上，優質課本不僅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更能令他們積極參與學習。換句話說，優質課本不但為學生提供知識，還讓學生參與，與學生雙向互動。此外，優質課本的教師手冊還包括教學策略，以供教師參考。

在指標中，有一些是比較特殊的，其中一項是「採用較輕的紙張，並以薄冊或按課題單元分冊印製，或採用活頁形式釘製」（課程發展議會，2002）。這項指標與家長及社會人士關注學生書包的重量有關。由於

香港教科書出版社多使用優質紙張，於是教科書比較重，學生的書包也相應重了很多，所以紙張的重量及針裝形式亦是評審的其中一些指標。

官員在收集評審報告後，會再整理，然後把評審報告發給出版商。在這些評審報告中，除了各指標的評審外，還有建議修改的地方，當中分為兩點，一點是必須修改的，多屬概念、資料、表述上的錯誤之處，又或者有嚴重的歧視性或政治上敏感的用語；第二類的是修改建議，出版商可自行決定修改與否，這類建議多數不牽涉嚴重問題，例如增強學習活動中學生的主動參與性等。

出版商收到了「成績表」後，一般都會按要求及建議作出改動。但是，近年發現有些出版商並未有完全按照修改要求進行及改動就貿然出版，所以官方定下新規則，在完成修改後，出版社要把修正的稿件再度送呈教育局，檢查是否確實依修改要求和建議，作出恰當的改動，才可以正式出版。

伍、討論

香港採用了私營形式開發教科書的政策，與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奉行的積極不干預等政策有很大的關係。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 1960 年代的財政司所提出的，在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政府的功能是盡量不干預市場的運作，這種自由經濟政策成為了香港政府一直恪守的政策（任志剛，1998）。直到 2006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曾蔭權先生宣稱積極不干預政策已不存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 Friedman）撰文，批評香港放棄這政策，更義正辭嚴地指出香港「將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了」（佛利民，2006）；當時的香港行政長官便提出香港不是放棄自由經濟政策，只是以「小政府，大市場」來運作。其實無論是積極不干預也好，小政府大市場也好，強調自由經濟，讓市場發揮其功能，是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

教科書是一種「商品」，所以政府一直避免把它納入「官辦」行列。要是把教科書列入官辦的話，很可能會出現以下多種不良狀況：

- 1.由官員負責編寫和研發教科書，質素並沒有保證。雖然香港政府的效率，在亞洲中排名甚高。而公務員的素質也相當不錯，但是官辦事業，避免不了一定程度的官僚制度，與私營事業的靈活性，不可相比。也正因為，香港政府擁有機場及地下鐵路，但都是以商業形式營運。
- 2.教科書的編寫性質，既帶有科學性，也有高度的原創性。某程度上與電影製作相似。就算把最優秀的導演、編劇、演員、服裝設計集合在一起，也不一定就能生產出優秀的作品。在商業運作下，不同的「生產者」發揮他們的專業，通過摸索，不斷修改更正，製作產品。由於市場開放，參與的出版社不止一個，他們往往會採用不同的編寫策略。因此，作品也有一定不同，當市場淘汰較次的作品後，留下來的，便是較佳的競逐者。假如「官辦」的話，便只有 1 家，研究者根本不大需要真正的投入。反正，只要把教材編出來，便不愁沒有市場。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指出「教科書是意識型態的承載品」(周淑卿，2003：60)，它承載著某些價值觀和價值體系 (Apple, 1989)。如果是公營的話，它會更傾向「保守」與「傳統」。在香港鼓吹自由的氣氛下，公營教科書是不大合宜的。不過，香港的經驗顯示，市場絕非萬能。被視為香港現代經濟創始者的夏鼎基爵士，也就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落實者，也曾在 1979 年指出有時候政府的干預是必須的，因為市場是有缺陷的 (任志剛，1998)。政府投資基建，如機場、公共房屋，以及公共醫療服務等，都是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而在 1998 年，當有「炒家」借亞洲金融危機操控市場，直接影響香港金融制度的穩定時，政府也投入大量公帑在股票市場上，阻止「炒家」破壞市場的正常運作。

經濟政策及金融制度如此，教科書的市場自然也有缺陷。首先是市場是否有足夠的需求來帶動供應，在普及教育階段，小一至初中的每級學生人數在 6 至 8 萬人左右，中四至中五的高中人數亦相若。但是在中六（前稱大學預科）階段，每個年級學生人數只有 3 萬人左右（詳見表 1）。

一般來說，主要學科或受歡迎的選修科目，學生的數目足以形成一定規模的市場，誘使出版商提供教科書。例如，初中的英文科教科書就有 3 家出版社提供教科書；而高中的地理科，也分別有 3 套教科書，可供教師選用，但是一些較為冷門的科目，又或者是因為教學語言問題，市場規模很少，出版社按商業原則運作下自然不會參與，於是學生無教科書可用。在 80 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提供財政資助，鼓勵出版社製作教科書予以中文為學習語言的學生。不過，這個計畫實行了 1 次後，政府再也沒有提供類似的計畫。

在臺灣教科書轉為私營後，有學者指出教科書的出版及市場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中包括：

1. 在自由市場下，出現了教科書為一兩所出版社所壟斷的現象（蔡清田、謝慧伶，2003）。
2. 國家選擇教科書，並未真正地以質素來選取，他們進行專業選擇的能力偏低，有部分更受到人情壓力、財物引誘等影響（蔡清田、謝慧伶，2003）。
3. 審查人員與教科書出版社的矛盾。
4. 人們覺得私營教科書出版商牟取暴利，教科書售價偏高。

表 1 2006/2007 學年香港中小學學生人數

學習階段	學生人數 (2006/2007)
小學 (共六年)	410,516
中一至中三 (共三年)	255,992
中四至中五 (共兩年)	161,461
中六至中七 (共兩年)	63,322

資料來源：出自香港教育局網站 (<http://www.edb.gov.hk>)。

香港的教科書市場也曾經出現類似的問題。有些已經得到舒緩，部分卻仍然困擾整個教科書的系統。以下將具體逐點說明。

現時，官方面對最大的壓力是教科書的價格高昂。每年暑假，當家長要為孩子購買教科書的時候，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幾乎都指出教科書的價格偏高，教科書出版商也會提出種種原因解釋，例如：他們要為學校和教師發展和製作教學光碟等輔助教具，這些配件都是免費送與學校的（消費者委員會，2006）。在商言商，其成本必須計入教科書的售價內。

這個價格問題與市場機制很有關係。香港的學生人口少，市場規模自然不大。但是教科書的開發成本高。出版商要有利可圖的話，自然要提高教科書的售價，有趣的是香港教科書的售價大約是臺灣的3倍，而臺灣的學生人口，也是香港的3倍左右。

有關教科書被一兩所出版社壟斷的問題上，香港的狀況是比較健康的。雖然在某些學科上某一兩個出版社的教科書成為主導者，但是個別出版社的壟斷往往隨著新教科書的出現而改變，就以地理科為例，在70年代，牛津大學出版社幾乎佔據了整個市場，而80年代至90年代中，精工出版社及文達出版社分別在初中及高中的市場中，佔絕對的領導地位，而近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又再成為市場的領導者。而從整個市場來看，有眾多出版社在競爭，具實力的超過5家。

要私營的教科書市場成熟的話，必須要保證市場機制能真正的運作。而教科書市場的用家雖然是學生，但是選擇教科書的是教師及校長。在7、80年代，校長和辦學團體對教科書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決策人數少，加上當時未形成廉潔風氣，出現了很多扭曲市場的行為，「送禮」之風盛行。隨著選擇教科書的權力下放至教師，而教師選擇教科書是要經過一定的程序，現時市場比較健康。當然要發揮得更好，教師的專業判斷能力很重要。香港教育局也頒布了指引，要求教師在選擇教科書時，應遵守的原則和考慮的因素（詳見教育統籌局，2007）。

在審查方面，香港的教科書開發系統並未出現很大的問題。一般的審查水平還算是不俗的。由官員邀請富經驗的前線教師或大學專家，以匿名形式進行評審。他們按照統一的標準，來審訂教材的水平達標與否。除了審視教科書的水平外，他們也提出改善的建議。按研究者參與教科書開發的經驗來看，評審能做到公正，也能提出有用的修改建議。因此，出版社與審查的矛盾不算很大。

陸、結語

雖然眾多課程及教學論者，有力地從理論角度提出教科書的弱點以及它對學習的不良倒流效應。不過，在香港的資源條件下，它仍然是教師喜歡使用的教學材料，教科書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香港教科書的開發系統，未用公營模式，這一點頗能配合教科書的開發特點。教科書的開發工作，本質上和電影、唱片有些相似，它包含了不少創作成分，編寫教材的學者、教師以及美工人員，要在學習理論、課程要求和創造條件下，把各種各樣相關的考慮整合，找出最好的配合來。因此，過程既要科學化，也需要一定的藝術性，這一點，與教學很相似。在研發的角度來看，編寫隊伍的空間是必須的，資源的支持也是必須的，把教科書研究開發工作合歸於公營系統，整個系統很可能會欠缺活力。

另一方面，要使市場機制真正有效地發揮效能，選擇教科書的人員必須能做到專業評價者的水平。從香港的經驗來看，要做到這些水平，有3個必須的條件：

- 1.要有一個廉潔的環境：過往，香港曾出現教育工研究者經受不住利益的引誘，鋌而走險，收受出版商的利益，選用其教科書，終於鋃鐺入獄。香港廉政公署發出指引，要求參與選書的教師或校長，必須採用透明、公平的方式挑選教科書。
- 2.教師必須懂得怎樣評價教材：蔡清田、謝慧伶（2003）指出，如果教師有這種專業能力，自然能做成專業的市場壓力和倒流效

應，迫使編寫者改善質素，出版商則會花更多心思及資源在研發教材，而不是安排飲宴，又甚或提供種種利益。

3. 從事教育研究者如能通過教科書研究，找出優秀教科書的特徵，然後以專業形式，把這些發現與教師、出版商、編寫隊伍分享，應能建立一個研發教材的專業學習團隊。事實上，有關教科書的研究遠遠追不上專業的訴求。「教科書的研究和批判也很少觸及教科書設計和生產過程，也缺少相關理論架構解釋教科書的生產。即使有關課程改革的論述，也多半止於要求更好的教科書，或反對依賴教科書的呼籲，很少研究教科書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周珮儀，2003）。欠缺科學研究，我們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從香港的教科書開發經驗來看，很難簡單地說明哪一種制度是最好的。不管是私管及公管制度，都各有利弊。而每一種制度，都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才可以把教科書的質素、功能較好地發揮。香港的制度並不是完美的，香港市民、教師及政府都不斷地尋找方法，來改善教科書的制度。政府剛於2008年10月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探索發展電子教科書的可能性，以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這一舉措，正好說明我們很多人非常地努力去尋求方法，來完善現有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教科書雖然只是教育系統的其中一枚螺絲，但卻與眾多關節連繫起來。因此，在設定教科書政策時，要考慮多方面的聯繫。

參考文獻

- 任志剛（1998/8/24）。政府並沒有乖離積極不干預政策。香港：信報。
- 佛利民（2006/10/7）。香港錯了——經濟學泰斗哀悼「積極不干預」。香港：明報。
- 周珮儀（2003）。教科書研究的現況分析與趨勢展望。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頁175-207）。高雄市：復文。
- 周淑卿（2003）。論中小學教科書評鑑機制建立的必要性。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頁55-78）。高雄市：復文。

- 林枚伶、陳國彥（2003）。社會領域教科書選用規准之研究。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頁 115-142）。高雄市：復文。
- 香港教育署（1994）。目標為本課程簡介。香港：編者。
- 消費者委員會（2006）。中小學教科書價格升幅擴大。*選擇*，357，43-45。
- 教育統籌局（2007）。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香港：編者。
-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編者。
- 教師工作委員會（2006）。「教師工作」委員會總結報告。香港：編者。
- 葉劍威、林智中、施明輝、黃錦輝、楊錦泉（2003）。中學會考活學地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黃顯華、李玉蓉（2006）。新修訂中學中國語文課程下的學生學習經驗（學校教育改革系列之 3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
- 蔡清田、謝慧伶（2003）。小學教科書選用問題之探究。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頁 144-173）。高雄市：復文。
-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語文教育諮詢文件。香港：編者。
- 課程發展議會（2002）。背景及優質課本基本原則。2007年7月1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842&langno=2>
- 藍順德（2002）。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審定政策執行之研究。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藍順德（2003）。從教科書的開放談教科書的定位。載於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教科書之選擇與評鑑*（頁 1-23）。高雄市：復文。
- 譚彩鳳（2005）。中文教師的教學信念及其對課程實施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香港。
- 譚萬鈞、林智中（2006）。香港校本課程設計計畫的後期發展評估。*課程研究*，3，29-34。
- Apple, M. W. (198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xt publishing. In S. de Castell, A. Luke, & C. Luke (Eds.), *Language authority and criticism—Reading on the school textbook* (pp.155-169). London: Falmer Press.
-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1988). *A general information paper on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roject scheme*. Hong K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4).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guide (primary 1-6)*.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 McClelland, J. A. G. (199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In C. Marsh, & P. Morris (Ed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pp. 106-128). London: Falmer Press.
- Morris, P. (1996). *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policies* (2nd ed.). Hong Kong: HKU Press.
- Shulman, L.S. (1987).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57(1), 1-22.